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  
现代改造（1928～1937）

朱煜◎著

以江苏为中心

Public Educational Museum  
and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1928—1937):

*Centered on Jiangsu Provin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  
现代改造（1928～1937）

以江苏为中心  
Public Educational Museum  
and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1928—1937):

*Centered on Jiangsu Province*

朱煜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  
江苏为中心 / 朱煜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 - 7 - 5097 - 3853 - 5

I. ①民… II. ①朱… III. ①国民教育－文化  
馆－研究－江苏省－1928～1937 IV. 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704 号

##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 ——以江苏为中心

---

著 者 / 朱 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 任 编 辑 / 曹长香 周永霞

电 子 信 箱 / shekebu@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师敏革

项 目 统 筹 / 王 纲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42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53 - 5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绪 论 .....	1
一 研究动机 .....	1
二 概念界定 .....	4
三 文献资料与研究现状 .....	14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23
第一章 江苏民众教育馆概况 .....	29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历史轨迹 .....	30
一 兴起的原因 .....	30
二 产生与发展轨迹 .....	38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组织人事 .....	56
一 内部组织及其演变 .....	56
二 人员的构成与素质 .....	65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的运行机制 .....	82
一 内部管理与工作机制 .....	82
二 “标准工作”的出台 .....	87
三 基本施教区、推广区与辅导区 .....	100
第二章 着力改良民众文化 .....	111
第一节 推动识字运动 .....	111
一 举办识字教育 .....	113
二 转向强迫识字 .....	130
三 与识字运动各方的关系 .....	139



第二节 参与私塾改良运动 .....	144
一 私塾改良运动的兴起 .....	145
二 建立私塾改良的辅导机构 .....	148
三 私塾改良的主要方式 .....	153
第三节 倡导风俗改良 .....	163
一 提倡国历及新年易俗 .....	163
二 设置作息钟：时间观念的教育 .....	167
三 反对迎神赛会，进行科学教育 .....	171
四 劝导放足 .....	175
五 其他改良风俗活动 .....	180
第四节 改良民众文化的特点 .....	184
一 基础性 .....	184
二 教育性 .....	187
 第三章 致力改善民众生计 .....	190
第一节 开展生计调查 .....	191
一 城市调查：在党政机关协助下开展 .....	191
二 乡村调查：在合作、互利中进行 .....	196
第二节 实施生计指导 .....	200
一 从事生计宣传 .....	200
二 提供小本贷款 .....	207
三 进行职业训练与农事指导 .....	217
四 进行合作指导 .....	229
第三节 个案分析：无锡南门民众教育馆之人力车合作社 .....	238
一 发起动机 .....	239
二 成立经过 .....	241
三 社务管理 .....	243
四 业务经营 .....	246
第四节 改善民众生计的特点 .....	249
一 应急性 .....	249

二 指导性 .....	252
<b>第四章 努力塑造公民观念 .....</b>	<b>254</b>
第一节 实行公民训练 .....	255
一 “草根组织”的建立 .....	256
二 公民训练中的“观念灌输” .....	264
三 农民生活学校的旨趣 .....	273
第二节 展览中的公民观念塑造 .....	282
一 “国难”展览与公民观念 .....	283
二 庙会与展览：“流动”的公民观念教育 .....	290
第三节 休闲娱乐中的公民观念渗透 .....	294
一 民众读物改良 .....	294
二 民众茶园的教化 .....	303
三 “戏剧化”的熏陶 .....	313
四 公民“教育电影” .....	319
第四节 塑造公民观念的特点 .....	331
一 草根性 .....	331
二 社会性 .....	333
<b>第五章 江苏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的实效分析 .....</b>	<b>335</b>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目标 .....	336
一 政府提出的目标 .....	336
二 民众教育馆的目标追求 .....	339
第二节 社会改造的成效与问题 .....	342
一 改造的成效 .....	342
二 存在的问题 .....	358
第三节 影响社会改造成效的因素 .....	362
一 政治环境 .....	362
二 国民素质 .....	367
三 自身缺陷 .....	371



余 论 江苏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模式分析	378
一 “制度变迁”下的民众教育馆模式	378
二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角色	381
三 与相关模式的比较	385
参考文献	392
后 记	408

## 绪 论

### 一 研究动机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的社会教育机构。它源于民国初年的通俗教育馆，产生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是当时政府推行并在城乡广泛设立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关”<sup>①</sup>。它发端于城市，推广至乡村；始于江苏，遍及全国。其开展的活动，从识字教育到生计指导再到公民观念的塑造，涉及当时城乡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它开展的活动与普通的学校教育不同，除了主要针对失学成人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35年，著名民众教育家俞庆棠曾说：“民众教育馆在近年发展之情形”，“无论在馆之数量上，经费上，职员上，其进展之速，均足惊人。在近年中国蓬勃的民众教育运动中，吾人不能不说以民众教育馆（有仅称教育馆，亦有称农民教育馆）的推广为最有力”，“民众教育馆已成了推行民众教育之中心机关”<sup>②</sup>。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了“唤起民众”，改造基层社会，积极推行民众教育。1928年，江苏率先成立民众教育馆。次年1月，江苏公布修订的《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要求，各县至少应设通俗教育馆1所，隶属于县教育局。7月，通俗教育馆更名为民众教育馆。年底，江苏多数县份已设民众教育馆。在此两年内，江苏的民众教育馆由城市发展至乡村。江苏创立民众教育馆以后，各省市闻风而

①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第1页。1933年2月，教育部召集民教专家会议议决，在普遍设民众教育馆的省份，以馆为社会教育施行中心；在尚未设馆的省份，以民众学校为施行中心。顾良杰：《民教专家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4卷第6期，第1101页（卷页）。

②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139~140、70页。



动，也陆续组建民众教育馆。1929年后，随着民众教育馆的数量增多，其成分日益复杂，从管理层次看，有省立、县立之分；从经费来源看，有公立、私立之别<sup>①</sup>；从施教对象看，有农民与工人、蓬户与渔民等差异<sup>②</sup>。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建制与活动种类，虽各馆依据地方情形，所定系统、事项多寡互有所侧重，但都不是单一的识字教育，而是涉及识字教育、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诸多领域的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时人感叹：“民众教育馆事业之设施，简直千头万绪，不胜枚举。”<sup>③</sup> 1932年2月，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2月又颁行《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由此使民众教育馆形成一种国家法定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江苏等地沦陷，民众教育馆或停闭，或迁移。抗战结束后，由于内战烽烟又起，加之其他因素，民众教育馆的影响力已趋于衰微。因此，1928～1937年是民众教育馆开展改造活动最为辉煌和对基层社会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的鼎盛时期。

本书选择抗战前江苏民众教育馆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的缘起与演进过程，审视它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探讨它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区域的江苏民众教育馆为考察对象，更能够“由特殊见一般”，有助于探寻政府对基层社会现代改造的基本面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一项中心工作是塑造“新国民”，进行现代化建设。1928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统政”“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从进入“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赓续军政时期已成之绪业”，另一方面是“萃全国

<sup>①</sup> 不过，私立民众教育馆为数甚少。以江苏而言，据1931～1932年度官方的统计，仅有1所私立民众教育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二十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第52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二十一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南京大陆印书馆，1935，第66页），此馆即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该馆由钮永建于1929年11月在上海县俞塘乡创办，次年5月正式开馆，中央党部及江苏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贴补，然经常费主要由创办人捐助（《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概况》，见《社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2页）。1933年夏，俞塘民众教育馆改为省立（《昨省府议决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改归省办》，《新江苏报》1933年6月28日第5版）。此后，未见江苏有私立民众教育馆。

<sup>②</sup>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第1～3、9页。

<sup>③</sup>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29页。

之治入于一党”，“而其进行之方针……于地方必须培养政权所赖以行使之国民”<sup>①</sup>。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不仅要在基层建立有效的政权组织，还要对基层民众进行现代化改造。鉴于民众教育馆是当时推进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江苏又处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因此，以江苏民众教育馆为研究对象，能凸显政府主导下以民众教育馆为依托的基层社会改造的实际情形，进而认识民教馆在基层现代化改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由于江苏民众教育馆具有数量多、普及率高以及鲜明的典范性等特点，从而更有个案研究意义。江苏是民众教育馆首创之省，江苏民众教育馆比任何一省都发达<sup>②</sup>。据调查，1934年底，江苏民众教育馆达262所，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sup>③</sup>。1935年，著名民众教育家董渭川指出：“有些省份尚不见得每县都能设馆一所”，而江苏“有一县设十馆八馆者”，为设馆最多的省<sup>④</sup>。江苏的民众教育馆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举办活动方面，也成为外省民众教育馆的“样板”。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在1944年还谈到：“现在主持民教事业的人，大都承袭在江苏时的作风。”<sup>⑤</sup>可见，抗战前的江苏民众教育馆在此后许多年对全国的深刻影响。与其他省相比，江苏民众教育馆更有“典范性”的研究价值。也就是说，本书论述对象虽然是江苏民众教育馆，但是通过对这个典型案例的考察，可以认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从事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活动的基本面相。

第三，研究民众教育馆的基层社会改造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民众教育馆的

<sup>①</sup>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29年3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636页。

<sup>②</sup> 陈礼江：《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第279页。

<sup>③</sup> 全国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调查表，中华图书馆协会编，1935，封三。另据官方统计，十七年度（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江苏民众教育馆有84所，位居各省第一，占全国总数的1/2以上（教育部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中华书局，1931，第8、37页）；至1936年，江苏民众教育馆353所，占全国总数的1/4以上，数量仍遥遥领先（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第4页）。

<sup>④</sup> 董渭川：《县民教馆任务之考虑》（1935年），董乃强编《董渭川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第93页。

<sup>⑤</sup> 渊：《听陈果夫先生谈民众教育》，《民教通讯》1944年第11期，第2页。



发起者和推广者是南京国民政府，而具体主事者则是知识分子，彼此的立场不尽相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执政理念趋向于集权，教育是其构建新国家认同的重要环节，而肩负对民众进行“宣传及实际之训练”的国民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有限，民众教育馆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政权向下延伸的基层“宣教人”角色。然而知识分子接受的大多是西方理念，其改造思路与行事方式或与政府的意图有些微出入。本书着重以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为研究的切入点，似乎更有助于揭示它在改造过程中对上层决策作微妙调整的一面，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第四，有关民众教育馆的学术研究，目前仍然比较薄弱。民众教育馆开展的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活动，先后经历识字教育、生计指导、公民训练三个阶段，对当时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状况的改善、公民观念的培养等，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史学界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厚，但对于民众教育馆，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具体到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翔实地考察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探讨江苏民众教育馆改造模式的意义，不仅有着较大的学术空间，而且可为当下中国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动基层文化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 二 概念界定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形成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教育机构。用当时江苏民教界人士的话说，就是“办理一般老百姓们的教育的地方”，“并且还注意推进社会进步”<sup>①</sup>。研究民众教育馆，涉及“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扩充教育”等名词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 （一）相关概念

第一，社会教育。“社会教育”（social education）一词，是1835年由德国教育家狄斯特威格（Diesterweg）提出来的。不过，当时德国的“社会教育”与后来我国的“社会教育”所代表的意义并不一致，德国

<sup>①</sup> 杨汝熊：《本馆的大概情形》，《新民之路》1933年第5、6期合刊，第2页。

的“社会教育”仅指以教育为出发点的校外青年工作<sup>①</sup>。在我国，“社会教育”一词是清末伴随着国外各种教育学说的传入而出现的。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有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者众多，因此，竭力提倡社会教育<sup>②</sup>。同年8月，政府公布的教育部官制规定，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成为教育部的三个职能部门<sup>③</sup>。在之后几十年中，教育部的内设机构屡有更易，然而社会教育司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社会教育”由此成为官方正式使用的概念，也确立了它在教育行政系统中的地位。

民国时期学者吴学信指出：“社会教育为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以外，所施行的教育活动的泛称。”<sup>④</sup>陈立夫强调，社会教育“以全民为对象，其范围不仅限于失学之成人与儿童”，“其功能亦不仅以扫除文盲为遂尽其能事”，而是以“养成健全之公民”为旨归<sup>⑤</sup>。就是说，社会教育是家庭和学校之外面向一般民众、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教育。

从民国初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社会教育的对象大体没有改变，即它是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之外面向普通基层民众的教育，此其一。其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教育的内容，由简至繁，不断丰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社会教育除了传统的识字补习教育、民众娱乐教育、图书博物与体育等事项外，还增加了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就是说，社会教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的范畴，而触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既有学校式的补习教育，更有社会式的推广活动。

第二，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一词，正式使用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不过，史料显示，早在此之前，即有人提出“民众教育”的概念。192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sup>⑥</sup>委员兼广东教育厅长许

<sup>①</sup> 詹栋樑：《社会教育理论》，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8，第1~3页。

<sup>②</sup> 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续）》，《光华》1936年第5卷第2期，第9页。

<sup>③</sup> 《教育部行政纪要》（1912年4月至1915年12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0辑（9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2~3页。

<sup>④</sup> 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第2页。

<sup>⑤</sup> 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陈序”，第1、3页。

<sup>⑥</sup> 1926年3月，广东国民政府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指导教育的行政机关。1927年6月，随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是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学术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行政委员会被裁并。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改大学院为教育部。



崇清拟订教育方针草案，提出 14 条纲领，内有“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一项；次年 6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起草《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亦述及民众教育，主张“民众教育与民众运动一并进行”<sup>①</sup>。1927 年 8 月，在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开幕典礼上，第四中山大学普通教育部部长程柏庐提出，通俗教育与平民教育，都是对于民众的教育，即所谓“民众教育”<sup>②</sup>。教育家汤茂如说，1928 年 1 月，俞庆棠约他到南京，协助创办民众教育院，当时程柏庐主张使用“民众教育”这个词，认为“民众”两个字很合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教，民众教育就是唤起民众的教育。俞庆棠、汤茂如两人都赞同程柏庐的意见，于是就开始采用这个名词。其后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时，正式决议政府所办的平民教育，一律改称民众教育<sup>③</sup>。从时间上看，许崇清、韦悫在拟订教育方针草案时，已经提出“民众教育”一词，1928 年，经俞庆棠等人的大力提倡，政府开始积极推行这种面向民众的教育。

何谓民众教育？民国时期学者的诠释言人人殊。著名学者孟宪承认为，民众教育“是对于全体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习惯上则只用以指对于失学或无力继续入学者的教育”，“它不同于补习教育，因为它有大部分仅是社会活动，而并不必具学校补习的形式”<sup>④</sup>。民众教育家俞庆棠认为：“民众教育是失学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进修。”“它的方式不限于‘教育机关’或‘学校’，凡改变群众行为，授与知识技能理想而改进其个人团体生活的工作（如合作社、乡村改进会、保甲会议、农业推广等），都是它有效的方式。”她指出，中国的民众教育，既是改进现行教育的一种教育运动，也是屡经国难刺激而激发的民族复兴运动<sup>⑤</sup>。在

<sup>①</sup> 《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二）》，《申报》1927 年 7 月 5 日第 10 版。

<sup>②</sup>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开幕典礼》，《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7 年第 6 期，第 23 页。

<sup>③</sup> 陈升侨：《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民教研究通讯》1935 年第 11 期，第 2~3 页；汤茂如：《民众教育概论纲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9，第 3 页。

<sup>④</sup> 瞿葆奎主编《孟宪承文集》卷四《民众教育·民众教育辞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 140 页。

<sup>⑤</sup>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 3 页。

俞氏看来，从小处着眼，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之外的补习教育与继续教育；从大处着眼，民众教育的范围包括合作教育、乡村改进教育、农业推广教育等一切有利于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教育运动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尽管学者的表述众说纷纭，然而也有若干相同或相近之处。如上述孟、俞的定义即颇为接近。或许我们可以用民众教育家高阳（号践四）的描述来对民众教育的内涵予以揭示。他指出：“民众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公民，改进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民众教育的对象偏重成年人”；“民众教育的项目可分健康、公民、生计、文字、家事、艺术（包含民众娱乐）等六项。这六项教育须相辅而行，并且实施的人应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就民众生活的需要出发。因势利导，渐谋达改进整个的社会及充实各个人生活的目的”<sup>①</sup>。就是说，民众教育以塑造健全的公民为旨归，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什么关系？民国时期占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众教育就是社会教育，二者名异而实同。马宗荣、陈礼江、赵冕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sup>②</sup>。杨佩文曾说：“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同样之模糊情形”，“其实施之事业，实难加以严密之分判”<sup>③</sup>。不过，从社会教育的起源以及社会教育司的职掌来看，民众教育还不能涵盖社会教育的全部内容，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民众教育就难以包括在内。至于有观点认为，社会教育“通常只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而民众教育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二种”，因此，“民众教育的范围，解释起来，可以大于社会教育”<sup>④</sup>，这个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因为民众教育机构虽然大多附设有民众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主要是面向失学成人而开设的，内容大多是文化补习、职业培训等，与正规学校教育

<sup>①</sup> 高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171~172页。

<sup>②</sup> 马宗荣：《从社会教育说到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1期，第72~74页；陈礼江：《社会教育的意义及其事业》，《教与学》1937年第3卷第1期，第14~16页；赵冕：《我所认识的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5期，第830页（卷页）。

<sup>③</sup>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10页。

<sup>④</sup> 甘豫源：《民众教育》，中华书局，1932，第10~11页。



具有明显的区别。相比而言，笔者认为，俞庆棠提出的“民众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围之内”的论点<sup>①</sup>，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形的论断。

第三，通俗教育。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是民众教育的前身。清末在自强救国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界及政府希望大多数民众能够发奋起来，共同救国，所以，想尽种种易于使民众接受的方法对民众进行教育，如演讲、白话报、戏曲、歌谣、影灯、图画等，通俗教育的名称由此而来<sup>②</sup>。它最早出现在中国近代官方的教育法令上，应在20世纪初年。1904年，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颁行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sup>③</sup>。各省学务处分课章程规定，学务处分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图书、游学七课，而普通课又分事务部及初等、中等、师范、通俗教育共五部<sup>④</sup>。这里已经出现“通俗教育”管理机构。1906年，《学部奏陈本部官制折》规定，学部设五司，其中普通司设师范教育科、中学教育科、小学教育科，通俗教育隶属于师范教育科<sup>⑤</sup>。同年，《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权限等事宜折》规定，各省设学务公所，下分六课，其中普通课在掌理本省中小学堂、师范学堂等事务外，通俗教育也归其办理<sup>⑥</sup>。在上述两份中央和地方学务官制的法令中，都再次提到了“通俗教育”。但是较之1904年《学务纲要》的规定，1906年学部成立以后，通俗教育在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附属于师范教育。

不过，清末社会毕竟开启了通俗教育事业，如白话报、宣讲所、简易识字学塾等，特别是随着预备立宪、改革政治制度的筹备，有利于提

<sup>①</sup> 俞庆棠：《民众教育的研究》（1934年），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124页。

<sup>②</sup> 高阳：《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5，第31～32页。

<sup>③</sup> 《学务纲要》（1904年），朱有璫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98页。

<sup>④</sup> 高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163页。

<sup>⑤</sup> 《学部奏陈本部官制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年8月14日），第160页。

<sup>⑥</sup> 《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权限等事宜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年8月14日），第166页。按，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8月），清廷将各省学务公所六课改称六科。

高民众文化程度、适应变革时代需要的简易识字学塾尤为中央政府所重视。不过，正如吴稚晖所说，“简易识字学塾，固为通俗教育之一种，然万不能以此概括通俗教育”<sup>①</sup>。在此期间，设立宣讲所、陈列馆等通俗教育机构，地方也颇为得力。旅美学者王笛曾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的关系，认为茶馆除了具有人们一边品茶，一边观看戏曲表演，享受休闲之乐的功能之外，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将“新的”“积极的”“进步的”情节加入传统戏曲中，以教育民众，借以宣传正统思想和价值观<sup>②</sup>。可见，这些场所与通俗教育也有关联。

应该说，我国形成较有声势的通俗教育运动，是在民国之后。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在教育行政方面，民国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使通俗教育由清末的附属地位，一跃而升至独立地位；通俗教育及其设施均订有规程，被确定为中央和地方视学应考察的事项之一。在教育设施方面，中央及地方均设立研究会组织。1915年7月，教育部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研究事项分为三部分：小说、戏曲和讲演。在教育内容上，民初中央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的关注重心转移到讲演以及小说、戏曲的审查、改良、编辑等方面，对简易识字学塾的督促不如从前，不过，由于地方政府及社会人士的重视，简易识字学塾仍然颇具规模。据民初对26个省市的调查统计，通俗教育会有233处，图书馆107所以上，通俗图书馆286所，阅报所1825处，巡回文库259处，博物馆13处，演讲所1881处，巡回演讲团943处，公共补习学校82所，简易识字学校4587所<sup>③</sup>。

通俗教育与民众教育之间是什么关系？民国时期的学者见仁见智，有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的，有认为通俗教育是民众教育的一部分的。对于它们的共同点，如教育内容浅显、通俗以及含有“感化”或“教化”

<sup>①</sup> 徐芳田：《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3卷第6期，第9页。

<sup>②</sup> 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93~94页。

<sup>③</sup> 徐锡龄：《中国民众教育发展之经过》，《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6期，第1092~1093页（卷页）。按：关于巡回演讲团，原文缺合计数字，笔者据文中附表逐省统计得出943团；关于简易识字学校，原文合计为3067校，现据表格逐省统计后改为4587校。又，俞庆棠将巡回演讲团的合计数字记为942团，简易识字学校为3067校，似误录，见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63页。



因素等，认识都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在它们的不同点上。傅葆琛指出，民众教育除含有通俗教育的成分，还有非通俗教育的成分，如科学讲习所、民众大学等<sup>①</sup>。笔者以为，这里应该明确两点。首先，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通俗教育作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始于清末，迄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2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众教育大体前后相继，二者是近代社会教育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不能混为一谈。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政府推行不力，加之实施办法不善、目标欠清晰等原因，教育成效甚微。时人感慨通俗教育“渐呈落伍之象，自民众教育问世后，各地通俗教育机关，均已一律淘汰矣”<sup>②</sup>。就是说，原先颇具声势的通俗教育渐为后来的民众教育所取代。其次，从教育内容上考察，民众教育的内容也包含某些通俗教育的成分，只是内涵更为丰富。例如，讲演、改良小说、编演通俗戏剧等通俗教育事项，在民众教育时期仍然属于重要的改造内容。

第四，平民教育。1920年，在法国从事华工教育的晏阳初返国。他有感于不识字的同胞甚多，基于在法国的经验，计划“除文盲，作新民”，积极倡导平民教育运动。这时，正当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思潮弥漫于全国，客观上促进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sup>③</sup>。1923年8月，晏阳初等在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平教会成立后，各省城、各城市均纷纷组织促进会，在以后的几年间，平民教育的气氛非常浓郁，形成一种影响全国的运动，以前的简易识字学

① 傅葆琛：《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续）》，《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9号，第3页（文页）。

②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10页。

③ 平民教育运动之前，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即提出“平民政的教育”，如陈独秀提出“惟民主义”的教育方针，李大钊强调劳工的教育权利，蒋梦麟提过“平民主义之教育”等。不过，“平民政”是一种教育思潮，而“平民教育”则是有规划、有组织的运动（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第602页）。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除晏阳初等组建的“平教会”外，著名的还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1919~1925）和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1919~1924）。前者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主要特点是借助露天讲演等进行平民教育的宣传；后者宗旨是“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主要是利用刊物进行理论宣传（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35~38页）。总之，这些平民教育，与晏阳初及“平教会”推行的平民教育有很大不同。本文所指的是晏阳初及“平教会”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